

微观基础、不确定性与 西方宏观消费理论的拓展

汪浩瀚

摘要: 消费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演变为 IS-LM 分析框架核心的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和绝对收入假说。西方宏观消费理论的演进始终贯穿着两条鲜明的逻辑主线:一条是与整个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潮流相吻合,即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个体消费基础;另一条是把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分析框架推进到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实现了从确定性分析到不确定性分析的拓展。不确定性作为转型经济中制度演进的一个基本特征,使得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基于转型期的宏观背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微观基础 不确定性 跨时最优选择 预防性储蓄 流动性约束

自凯恩斯 1936 年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其宏观经济分析并提出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并一直成为宏观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的话题。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持久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关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可谓数不胜数。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一、消费行为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

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关于居民消费的分析本质是基于消费者跨时决策理论在消费领域的不同应用展开的,可以说,20 世纪后半期的消费理论研究,都是以消费者跨时选择为基础,研究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交替关系的跨时选择。跨时最优选择理

论的众多基本观点都包含在无风险、跨时偏好随时间可加且可分离的状况中,其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 = v_1(c_1) + v_2(c_2) + \dots + v_T(c_T)$$

其中,每一个别时期的子效用函数 $v_t(c_t)$ 是其因变量的递增的凹函数。效用的最大化将受到生命周期预算的约束,后者可用跨时预算约束表示:

$$\sum_{t=1}^T \frac{c_t}{(1+r)^t} = A_1 + \sum_{t=1}^T \frac{y_t}{(1+r)^t}$$

这里把实际利率在时间中视为常数,仅考虑一种无不确定性的理想世界。可加效用和预算约束相结合,将能够显示出生命周期行为的一种简明和有用的特征。其基本分析模式是:在跨时预算约束条件下,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将通过分配一生的收入来规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其预期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

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的运行机制及过程是建立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总量消费函数关于个人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稳定关系上。凯恩斯消费函数是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决定消费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给出了群体中总量消费与总量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系统和稳定的关系。其著名的消费心理规律坚持把当前收入作为消费的主要成分并将消费倾向置于突出地位,使其消费函数理论成为宏观政策分析的重要依据。然而,许多经验和关于总量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表明,总量消费和收入之间的

这种稳定性关系是否真正存在和有效值得推敲。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宏观经济模型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周期波动,消费理论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确定性分析基础。

从西方宏观消费函数理论的微观基础来看,主要是基于对消费者行为选择的研究。由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于该理论是建立在对消费心理的主观判断上,因而也就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由于当期消费的变化会通过储蓄来影响未来的收入和消费,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必然是跨期最优选择的结果。在跨期最优选择的作用下,消费并非如凯恩斯消费理论那样仅由当期收入所决定,而是取决于行为人一生中的财富现值总和。在弗里德曼消费模型中,消费者注重根据他们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来制定当前消费决策。在从个体消费转换到总量消费时,弗里德曼清楚地表明总量消费的函数形式将不同于个体消费函数,他并没有试图导出总量消费函数形式,更没有从理论上导出属于总量函数的变量形式,因为像家庭构成、年龄等效用因素会随不同人发生相应变化,因而总量消费函数决不是通过个体消费函数的简单加总而获得。生命周期消费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应用跨时选择的思路去说明在个人或家庭的生命历程中,消费是如何随年龄而演化的。

生命周期 - 永久收入消费函数模型作为上述两种模型的扩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假说通过引入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动机,以跨时最优化消费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两者都是以个人行为理论为基础,都经受了个体或家庭消费数据的检验,重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不仅具有良好的微观分析基础,而且还能较好地解释在估计凯恩斯消费函数时使用截面数据和时序数据的模型差异。

霍尔的随机游走理论假说,考察了一个消费者最优化的欧拉方程,在假定效用函数为二次型的条件下得到: $C_t = C_{t-1} + e_t$,其中 C 为消费, t 是时间, e 是随机项,满足 $E_{t-1}(e_t) = 0, t=1, 2, \dots, T, E_{t-1}(\cdot)$ 表示以第 $t-1$ 期的有效信息为条件的期望。这说明消费遵循随机游走,如果消费被预期要变化,则个人在平滑消费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假定消费被预期要上升,这意味着当期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预期的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从而个人提高当期消费后景况可以改善,因此个人调整其当期消费,直至不再预期消费要变化为止。在霍尔消费模型中,个体和总量方程形式是相同的,通过对个体消费需求

函数加入总量值以替代原有的个体变量值,并进一步求解个体最大化问题导出总量消费函数。已有一些经济学家对霍尔的总量消费函数所遵循的随机游动规律进行经验验证,例如,可以设计一种统计假设进行说明:

原假设即霍尔的结论: $C_t = \alpha C_{t-1} + \epsilon_t$;备择假设为消费主要取决于过去若干期收入水平的变化:

$$C_t = \alpha C_{t-1} + \beta_1 Y_{t-1} + \beta_2 Y_{t-2} + \beta_3 Y_{t-3} + \beta_4 Y_{t-4} + \epsilon_t$$

其中, c 表示消费, y 表示收入水平, ϵ 表示随机误差项。经验模拟结果发现,当消费者没有流动性约束时,在个体水平上,消费者确实遵循随机游动规律,但总量消费却取决于滞后的收入变量;当消费者有流动性约束时,在个体水平上,消费取决于滞后的收入水平,而总量消费却遵循随机游动规律。微观个体水平与宏观总量的结果是矛盾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如果个体消费数据支持了跨时选择理论,但总量数据却拒绝了相应的理论,这说明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准确地协调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实证研究结论的问题。

二、不确定性条件下西方宏观消费基本理论的发展

不确定性至少有两个基本来源:预期的不完全性和人类解决复杂问题时能力的有限性。无论是哪一个来源,不确定性都表现为对有关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可能出现的结果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由于时间和不确定性关系非常密切,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用未来消费代替现在消费肯定将增加风险。因此,在预期不完全的条件下,所谓的最优化经济分析都是难以实现的。消费理论和经济学其他理论处理不确定性的标准方法是用预期效用代替效用,也就是用下式表示:

$$U = E_t \left[\sum_{k=1}^T V_k(C_k) \right] = E_t \left[\sum_{k=1}^T V_k(C_k) | I_t \right]$$

上式中最右边一项强调 t 时的预期 E_t 是受 t 时可利用的信息 I_t 限制的数学期望。虽然消费者选择每一时期的消费水平,但在未来的时期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无法对那些时期的消费作出最终选择。每一时期的价格、收入和资产收益只有在那一时期到来时才知道。因此,只要不是特别必要,消费者没有理由许诺自己的未来消费。因此,在 t 时未来消费是不确定的,一个理性消费者的适当做法是最大化上式表述的预期效用。

在凯恩斯之后,弗里德曼最早尝试对不确定性与消费者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他从收入的非预

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此后,利兰德(Leland, Hayne E., 1968)发现,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上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从而吸引居民进行更多的储蓄,利兰德的发现被人们称为预防性储蓄假说。在20世纪70年代,霍尔提出了对消费理论研究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随机游走假说,他在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引入了理性预期,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迪顿(Deaton, Angus S., 1991)、弗莱明(Flavin, Marjorie A., 1985)泽尔迪斯(Zeldes, Stephen P., 1989)、卡巴莱罗(Caballero, Ricardo J., 1990)、卡罗尔(Carroll, Christopher, 1992)和金博尔(Kimball, Miles S., 1996)等也相继建立了许多模型对不确定性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弗莱明通过加入流动性约束对理性预期框架下的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进行了改造;泽尔迪斯、金博尔(1989)等进一步指出,若消费者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且税收是收入的增函数,则较低当前税收对此后较高税收的替代将减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当前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并且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遵循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消费由目前可动用收入决定,没有考虑个人对预期收入或对消费的时间偏好。杜森贝里在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进一步假定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和不可逆性,认为短期内消费函数受经济周期影响,而长期过程中消费受示范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改变缓慢,消费支出具有不可逆性,前期消费将影响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并且消费者的消费变动依赖于其相对收入水平。

莫迪里安尼与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假定没有流动性约束且不存在不确定性,消费取决于永久收入,而永久收入是跨越消费者一生时段收入的平均值。人们的现期消费支出并不完全取决于现期收入,而主要取决于他的预期收入即永久收入,消费者将可预期的较为稳定的长期收入,或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均匀的支出分配,以追求跨时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其中,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储蓄可将不均衡收入路径转化为平滑基础上的消费路径,达到效用最大化。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中,其边际效用为一线性函数,边际效用的期望值等于期望值的

边际效用,从而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本身并不影响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最重要的结论是:消费的演进不是收入决定的,消费模式不是由生命周期中劳动收入的短期模型决定,而是由偏好和生命周期需求决定的。只要消费者能够贷款还款,预期的收入变动就不会影响消费。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消费便没有理由依收入而定。显然,如果排除不确定性,跨时最优选择将按照凯恩斯-拉姆齐规则选择最优消费路径和水平。

然而,生命周期假定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对不确定性重视不够,降低了该理论的解释效果。与莫迪里安尼不同的是,弗里德曼明确表示消费者积累财富的目的之一便是预防未来收入难以预料的下降,即考虑到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且更为强调个人的遗产动机。但是,由于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区分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以及永久收入的估算问题,而非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和消费行为特征上,所以不确定性因素并未真正纳入其理论模型。上述两种消费理论从本质上都没有真正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在跨期最优模型中这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收入水平,因而也就可以在初始时期完全确定一生的最优消费路径。现实中人们未来的收入水平是不确定的,行为主体只能利用相关信息对未来的收入水平进行预测。按照不确定性条件下永久收入假说的结论,只有未预期的永久收入的变化才能影响最优消费路径。由于预期的永久收入随着信息的变化而变化,最优消费路径是无法事先确定的。

霍尔的结论是: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服从随机游走,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是对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模型的扩充和修正。它们强调预期和不确定性,重视滞后消费、消费反应收入波动的敏感性及对特定时期而非整个生命周期或持久收入时期消费约束条件的研究。随机游走假说认为消费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人收入预期增长率与消费预期增长率无关;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不会产生影响。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检验,结果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弗莱明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实际消费变动与预期劳动收入变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并将此现象称为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

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的前沿是以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为代表,这两种理论均基于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考虑,在跨时最优的分析框架内对随机游走假说的修正,使得模型更符合实际。预防性

储蓄理论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及消费者跨时优化选择行为,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只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居民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增加储蓄,居民所增加的这部分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既可以来自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可以来自未来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把前者称为个人风险,把后者称为系统风险。对于消费来说,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即为流动性约束。而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流动性约束不论何时发生,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即使是发生于未来也会减少当期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只要个人能够用未来收入作担保就可以在相同利率水平上借钱消费,这种假设与现实不符。因为现实中人们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融资需要,从而消费行为存在流动性约束。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理论假说的演变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的一种路径:由当期消费扩展到跨期消费,由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扩展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由较宽松下的预算约束扩展到较严格条件下的预算约束。

三、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 动机与流动性约束理论

近年来,消费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不确定性明确地引入到实证研究中。不确定性作用于消费的一个途径是产生预防性储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未来某期的消费量将高于本期消费量,即本期消费产生低谷,未来产生高峰;另一个途径是加强了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在消费理论中,一般把流动性约束定义为消费者不能利用消费信贷进行负债消费。由于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是以借款人的预期收入流为基础,当这个收入流的不确定性增大时,金融机构就会出现惜贷现象。

1. 预防性储蓄动机与不确定性

储蓄动机是研究消费问题和消费函数的基础,它回答的是人为什么要进行储蓄从而缩减即期消费的问题。对居民储蓄动机的研究,一般涉及生命周期动机,即储蓄是为了预防未来的收入下降或者支出增加;跨期替代动机;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规避风险等几个方面。这些动机的交织说明影响消费的储蓄动机是复杂而多样的,不仅同一时间不同人进行储蓄的动机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储蓄的动机也可能并不相同。储蓄对不确定性的反应是正方向的,消费能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追踪收入。消费者进行储蓄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约束下,现期是否储蓄和储蓄多少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收支状况的预测;而另一个原因是应对难以预料的意外冲击,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以不同的概率表现形式影响着每一个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事实上,这些动机的存在主要还是与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相联系的。

预防性储蓄动机试图说明消费者为什么要掌握大量财富或者为什么不保有财富。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凯恩斯,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下降而进行储蓄。利兰德定义预防性储蓄为由未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当效用函数三阶导数大于零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性情况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也就会吸引消费者进行储蓄,将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此时的消费者将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储蓄主要是为了避免未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所带来的冲击。因此,以效用函数为正的三阶导数与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结合降低了当期消费,从而提高了储蓄,这一储蓄就是预防性储蓄。其研究的结论隐含着:对于时际可分的效用函数,当且仅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为正,即边际效用为凸函数时,预防性储蓄是正的。预防性储蓄假说的理论意义在于放弃了二次型效用假设,从而就把预防性动机包括进来,使不确定性真正成为消费函数的组成部分。卡巴莱诺(1990)指出,预防性储蓄可以用来解释总消费对收入波动的过度敏感性;卡罗尔(1992,1998)认为,预防性储蓄行为对消费所引致的经济循环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财富的39%~46%归于不确定性。

总之,不确定性情况下,消费自然依赖于像确定性情况下一样的变量:当前的与预期的收益率、居民收入以及财富状况,但不可多样化的收入的不确定性通常会产生附加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意味着影响消费的不仅有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且有关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经验验证时,检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度量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卡罗尔(1998)用等价预防溢价、家庭收入的方差与收入的对数方差三种方法描述不确定性;戴南(Dynan, Karen E., 1993)使用支出的变动和失业风险来度量消费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罗默(Romer, David)用消费增长率的方差来表示

风险,认为预防性储蓄对预期消费增长将有显著影响;迪顿将利率的随机性波动引入了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性来源于 $\ln C_{t+1} - r_{t+1}$ 的条件方差,其中是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2. 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

流动性约束理论放弃了传统消费模型中消费者可以自由借贷的假设,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动机是防止流动性约束。最早关注流动性约束问题的有托宾(Tobin,James,1971)、弗莱明(1973),他们认为把流动性约束吸纳进储蓄模型中是相当重要的。泽尔迪斯(1987)在保留二次型假设的前提下,检验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结果证明流动性约束可以使实际消费明显偏离确定性等价解。

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可用以下5个命题概括:(1)如果0期流动性约束生效,消费者不会为1期不确定性采取预防性储蓄措施;(2)如果消费者既无流动性约束也无不确定性,则消费者将会使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相等;(3)当消费者预期未来某一时期会面临流动性约束时,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4)当消费者面临不确定性增加时,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5)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某一时期支出与现在支出之间存在差距时,消费者会以加倍的速度减少当期消费。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会打破短期和长期行为预测之间的联系,在一个无流动性约束的消费模型中,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不仅能使当期和下一期支出的预期边际效用均等化,也能使远期支出的预期边际效用均等化;而对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通常是短视的。流动性约束对消费水平具有以下潜在效应:它能从两方面提高储蓄:第一,当流动性约束是紧约束时,流动性约束使个人消费较没有流动性约束时要少;第二,即使流动性约束在当期不是紧约束,但在未来必须遵从流动性约束时也会减少预期消费。所以,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促使个人进行储蓄以此作为对收入下降效应的保险。

消费可能不遵循随机游走假设的一个原因是消费者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如果消费者无法实施借贷且当期收入低于永久收入,则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的可预测变动产生出消费的可预测变动。流动性约束可能导致消费对收入的可预测变化的过度敏感性,个人在借钱时,如果面临高利率,则当他们现有资源较少时,他可能选择不借钱以平滑消费;而如果消费者根本借不到钱,则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在现有资源较少时,进行低消费。因此,流动性约束使得当期收入对消费的重要性比永

久收入假说预言的更大。

我们知道,储蓄的预防性动机通过一个凸的边际效用函数而产生,即随着消费不确定性的增加,期望边际效用将上升。若存在借贷约束,与低消费水平相比,消费者更不愿意高消费,从而期望边际效用更趋上升。可见,由于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将进一步加强。

然而,这些假说与现实都存在一定的距离。实际上,消费者在跨期决策时并不都能平滑自己的消费。当人们不能在低收入时通过变现自己的金融资产或借款来保持正常的消费水平时,就会面临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有效,意味着消费者为了实现当期消费,只能以低于市场价值变现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或者以高于市场平均借贷利率借入资金。此时,消费者无法通过正常借贷实现最优和理想的消费计划,无法实现收入的自由跨期转移,无法进行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平滑。

四、关于经济转型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转型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整个转型时期,由于制度变迁的外生性导致各经济决策主体的行为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过程,这种不稳定的制度演进背景使得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集中表现为:制度的不确定性、个体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备性等。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政策层面看,经济行为者对一项既定政策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项政策是如何被选择的。在一个动态世界里,现在行动的最优选择不仅取决于当前环境,还要取决于对未来环境的预期。在关于最优消费者行为的现代观点中,当前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资源,而且取决于预期的未来资源,即取决于永久收入。消费者对政府政策的反应同样也是前瞻性的,在决定行为方面,对未来政府政策的预期会特别重要。当预期未来政府政策对于当前的最优行为至关重要时,显然,经济主体会利用当前可获得的信息来试图预测这些政策。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消费者将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即把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当前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即减

少当前的用于消费的收入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收入减少的风险。消费者的不确定性预期越大,消费者的风险均摊的动机就越强烈。要增加当期消费,必须尽可能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以增加消费者抵御风险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消费行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消费者的心理面临较大压力,就业以及各种社会保障等体制变革,都给人们的消费观念带来冲击。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使得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增加,其行为具有典型的制度转型的不确定性特征。人们已经注意到未来生活的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如城镇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预期教育支出的增长、住房制度的改革及养老方式的变化及信贷与保险市场的欠发达等经济因素,导致居民总体消费更趋于保守。如何更加合理地进行消费支出的安排,需要消费者加以理性判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居民储蓄比率持续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61.3%降至2004年的53.6%,已经创了建国以来的新低。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与居民消费水平难以有效提升具有复杂的原因,是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些原因包括消费失衡、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就业不足失业现象严重、产业结构难以顺利调整与有效提升、教育收费过高、医疗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缺乏完善的消费环境等多种原因。在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幅缓慢。这充分说明城乡居民并没有能充分享受到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深入分析制度转型时期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探寻转型时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规律及其变化趋势,在“十一五”时期真正启动消费,切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前提。只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制定切合实际的扩大居民消费的基本对策,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

五、若干评价与启示

由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整个IS-LM模型的核心,质疑其消费理论的正确性无疑将动摇凯恩斯

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石。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为代表在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对消费理论的改造和完善打破了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的统治地位,推动了西方宏观消费理论在不确定性分析范式下的拓展,并对以IS-LM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发起了挑战。

尽管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质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是对临时收入的调节,而是直接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外,流动性约束所引致的消费行为与基于预防性动机的行为之间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流动性约束模型强调消费对收入的直接反应而较少顾及未来;而预防性储蓄模型则强调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贴现的。所以,这两个模型都与传统的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模型存在着很大差异。

西方消费函数的模型是假定社会制度相对稳定,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直接反映是人们收入的不确定性。而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人们不仅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面临制度的不确定性。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首先要能保证不确定性的存在,然后要能实现在合理范围和合理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还应能有效地利用不确定性。市场机制在保证不确定性存在的同时,亦创造了一套分散不确定性、防范不确定性的机制。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渗透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只有将制度变量纳入到消费者的选择模型,才能较完整和现实地解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

综观宏观消费理论的发展路径,我们不难总结出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始终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消费理论的演进与整个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潮流相吻合,即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个体消费基础;另一条主线是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分析框架拓展到不确定性分析框架。自凯恩斯首创消费函数理论后,莫迪里安尼、弗里德曼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里,力图为宏观消费理论奠定相

应的微观基础,并实现了从短期分析到长期分析的跨越;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实现了从确定性分析到不确定性分析的拓展。就分析所使用的工具而言,大多消费模型都使用了最优化分析方法,莫迪里安尼和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是建立在跨时选择基础之上,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和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模型同样也都利用了最优化方法。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到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再到不确定性因素纳入消费函数,消费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假说-实证检验-假说修正与再检验-再理论假说的过程;同时,整个消费函数理论与模型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每一步拓展都与实证分析密不可分。如何基于转型期的宏观背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便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这方面系统性研究的开展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释:

参见安格尔·迪顿:《理解消费》,中文版,2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寻找解的一个便利方法是采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该原理说明,对于一个既定时期的状态变量的任意给定值,从该点起推出的解必定是最优解,再结合引入的价值函数,用逆向归纳法可得出解来。

霍尔不是第一个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家,这方面的先驱应是萨缪尔森(1969)和默顿(1971)。

在离散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拉姆齐规则意味着:消费增加保持不变或减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量是否超过、等于或小于时间偏好率。其直观含义是: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以在未来享受更高的消费则越合算。于是,如果在初始时资本的边际产量很高,则消费将在最优路径上随时间而增加。

永久收入假说对消费如何对收入未预料到的变化起反应也作了预言:消费对收入未预料到的变化起反应的程度小于永久收入假说预言的程度。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

参考文献:

1. Blanchard, Olivier Jean and Mankiw, N. Gregory, 1988. "Consumption: Beyond Certainty Equival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Vol. 78, No. 2.
2. Blundell, R. and Stoker, T., 1999. "Consumption in 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3, pp. 603-640.
3. Caballero, Ricardo J., 1990. "Consumption Puzzles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5, January, pp. 113-136.
4. Caballero, Ricardo J., 1995. "Near-Rationality, Heterogeneity,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7, No. 1.

5. Campbell, John Y. and Mankiw, N. Gregory, 1990. "Permanent Income, Current Income, an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6. Campbell, John Y. and Deaton, Angus, 1989. "Why is Consumption so Smoo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pp. 357-374.
7. Carroll, Christopher, 1994. "How Does Future Income Affect Consum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February, pp. 111-147.
8. Carroll, Christopher and Samwick, Andrew, 1998. "How Important is Precautionary Saving?"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0, August, pp. 410-419.
9. Deaton, Angus S., 1991.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Econometrica*, 59(5), 221-48.
10. Deaton, Angus S., 1992.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Dynan, Karen E., 1993. "How Prudent are Consum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December, pp. 1104-1113.
12. Echeverria, Cristian, 2002. "Income Uncertainty,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the Option Value of Sav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3. Flavin, Marjorie A., 1981.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to Changing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9, No. 6, pp. 974-1009.
14. Flavin, Marjorie A.,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Hall, Robert E., 1978.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6, No. 6, pp. 971-987.
16. Kimball, Miles S., 1990.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Econometrica*, Vol. 58, January, pp. 53-73.
17. Leland, Hayne E., 1968.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2, August, pp. 465-473.
18. Zeldes, Stephen P., 1989. "Optimal Con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 Deviations from Certainty Equival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4, pp. 275-298.
19. Zeldes, Stephen P., 1989.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April, pp. 305-346.
20. 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1. 龙志和、周浩明:《西方预防性储蓄假说评述》,载《经济动态》,2000(1)。
22. 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中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23. 孙凤:《消费者行为数量研究——以中国城镇居民为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4.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载《经济研究》,2001(11)。
25. 汪浩瀚:《不确定性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石》,载《财经研究》,2002(12)。
26. 臧旭恒、裴春霞:《流动性约束理论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储蓄》,载《经济动态》,2002(2)。
27. 朱春燕、臧旭恒:《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载《经济研究》,2001(1)。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6
宁波大学商学院 宁波 315211)
(责任编辑: N)